



基于国家(地区)的 创业活动驱动模式研究

孙永波¹, 丁沂昕¹, 杨 阳^{1,2}

1 北京工商大学 商学院, 北京 100048

2 国有资产管理协同创新中心, 北京 100048

摘要: 创业活动作为多方主体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方式, 受到宏观、中观和微观多层次因素的影响, 创业活动驱动模式难以用单一因素解释的现实已得到学界的共识。尽管创业活动存在相当大的国家差异, 但对潜在影响因素的解释有限。多维性、复杂性是未能充分解释创业活动成功的根源, 必须寻求明确界定这些因素的一个整合框架。

以体现多个复杂条件组合形态的组态观为视角, 探讨由制度、资源和企业家认知3个因素组合形成的创业活动驱动模式的特征, 以及不同经济体之间的驱动模式差异与创业活动驱动模式的转化特质。选取2012年至2016年全球创业观察数据库中87个国家(地区)作为研究样本, 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并提出命题。

研究表明, ①对制度、资源和企业家认知3个因素采取组合且突出核心的组态模式可以从多个层面综合解释创业活动驱动模式。②机会警觉、创业意愿、非正式制度和R&D转化是提高创业活动数量的关键因素, 基础设施与R&D转化的组合是提升创业活动质量的核心条件。③要素驱动经济体强调由企业家认知因素刺激创业活动数量; 效率驱动经济体既发展创业活动数量, 也关注创业活动质量; 创新驱动经济体重视资源基础对创业活动质量的促进作用。3类经济体之间存在较大差异。④创业活动由以企业家认知驱动为特征的数量模式向以资源驱动为特征的质量模式转化。

基于组态视角, 解释了基于宏观层面的制度因素、中观层面的资源因素和微观层面的企业家认知因素的组合模式, 进一步明晰了不同经济体发展创业活动的关键因素, 发现了创业活动由数量向质量转化的变动特征。研究结果推动了创业活动数量和质量驱动模式的发展, 并为处于不同经济体中的创业企业合理协调3个因素的关系提供理论指导。

关键词: 创业活动; 制度; 资源; 企业家认知;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中图分类号: F124.3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672-0334.2020.03.007

文章编号: 1672-0334(2020)03-0078-19

引言

不同国家的创业活动水平存在显著差异, 而且这些差异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稳定^[1]。如何准确捕捉

引致创业活动的关键因素, 并据此从整体、综合的角度发现存在的驱动模式, 是困扰许多国家开展创业活动的一大难题。已有研究大多用制度因素^[2-3]、

收稿日期: 2018-07-08 **修返日期:** 2019-11-0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8BGL083, 172DA056); 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9172007)

作者简介: 孙永波, 管理学博士, 北京工商大学商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为企业运营管理, 代表性学术成果为“商业模式创新与竞争优势”, 发表在2011年第7期《管理世界》, E-mail: sunyb@btbu.edu.cn

丁沂昕, 北京工商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创业管理等, 代表性学术成果为“创业导向、外部知识获取与创业机会识别”, 发表在2018年第5期《经济与管理研究》, E-mail: dingyixin233@163.com

杨阳, 管理学博士, 北京工商大学商学院、国有资产管理协同创新中心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FDI和集团管控等, 代表性学术成果为“集团化企业制度同构性与决策权配置关系研究”, 发表在2016年第1期《中国工业经济》, E-mail: yangyangseu@162.com

资源基础^[4]和企业家认知^[5-6]解释创业活动的驱动模式,并仅从单一或交互角度考虑,却忽视了创业活动的复杂性特征。

基于对Timmons模型的情景分类^[7]以及PENG et al.^[8]的制度基础观和资源基础观,本研究提出包含制度、资源和企业家认知的基础框架。纵观三方面,创业企业需顺应制度以获取合法性,进而获取生存和发展所需的资源^[9]。企业生存和成长依赖于资源,不同类型的资源组合可以构成有价值的、稀缺的且难以复制的资源束^[10]。如何响应制度^[11]或配置资源^[4],从而在市场中发现机会^[12],这又依赖于企业家的认知能力。已有研究虽然认同某一因素单方面或交互可以刺激创业,然而,这会导致仅关注引发创业活动的局部条件而无法全面把握其实现机制。

本研究认为,已有研究没有对创业活动因素进行基于宏观、中观和微观不同层面的综合考虑,仅从单一式或加总式或交互式的简单对称关系进行研究,不能综合解答实现创业活动的驱动模式。实际上,由于不同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其创业活动水平存在显著差异^[1],从而导致不同经济体的创业活动表现出兼有各自情景的特征,然而,已有研究也未解释不同经济体的创业特征差异。因此,本研究探索制度、资源和企业家认知是如何组合搭配以驱动创业活动的成功。基于因素组合引发因果复杂性的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适合回答以上问题,同时响应了BEYNON et al.^[13]支持基于组态研究的QCA方法在创业领域研究的倡导。组态研究强调从整体视角,考虑具有相似或相互影响的属性集合所形成的模式,即组态是一种对导致结果变量产生的多个复杂条件的组合形态或模式。

1 相关研究评述

1.1 制度和创业活动

制度是企业 and 组织成长的背景,企业生命周期的所有活动都无法背离其所处的制度环境^[14]。随着时代经济的演化和发展,学者们意识到制度不仅仅是背景条件,还直接决定了企业的战略行动^[8]。制度环境具有多样性,寻求外部支持和稳定的企业会考虑各种不相容的制度结构因素^[15]。已有研究从不同角度对制度的认知可归纳为战略学派、社会学派和融合两学派3种视角。

①战略学派的制度研究者诺斯^[16]认为,在一个国家中,制度被视为企业或组织生存需遵守的规则,其约束企业或组织嵌入到法律规则、社会规范及文化中^[17]。将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指国家或社会以具体的条例形式存在的法律、法规、章程等,非正式制度是指以非正式形式存在的价值观、文化和社会规范、共同行为准则等。②社会学派研究者斯科特^[18]将制度划分为规制、规范和认知3个维度,规制制度是指国家和政府部门制定的规章制度,规范制度是存在于社会中的惯例的、评

价性的、义务性的标准,认知制度是指遵守共同的情景界定、参照框架或被认可的角色模板的规则。③PACHECO et al.^[19]整合两个学派观点,按照制度的跨层次性将其分为实践、标准和政策3个层面,实践是内含在组织内部、获得认可度和接受度的行为惯例,标准代表将实践转化成可以引起产业变革的且企业自愿实践的规则集,政策是国家性的或全球性的具有强制色彩的明文条例。

制度环境下的创业活动具有两种基本特点,一是嵌入性,即嵌入制度环境中开展创业活动,强调企业为获取合法性对既有制度的同构^[20-21],该类研究强调制度结构对行为主体单向的塑造作用^[22]。行为主体要将他们的行动融入到社会结构中,以获得制度对行为主体的身份认同^[23],从而获得基于个体层面的自我判断的合法性(即正当性)和基于群体层面的外界观察者达成普遍认识的合法性(即有效性)^[24],从而在合规的条件下开展创业活动。二是能动性,即在制度中发挥主动性以开展创业活动,强调企业不屈服于制度压力,主动改变甚至重构制度环境^[21]。该观点主张组织对内部和外部环境的改变能力,强调组织选择、操纵甚至创造制度环境^[11],从而创造有利于创业活动的制度条件。因此,行为主体会在制度领域内形成对社会的观察和思考方式的潜在假设^[20],并判断和评估现有制度条件,从而做出相应行动^[24]。虽有学者从企业角度解释行为主体嵌入与能动的交互过程^[25],但未从全球角度通过数据分析处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制度环境下的企业如何协调制度与其他因素的组合关系。

1.2 资源和创业活动

资源基础观假设资源在企业间是异构分布的^[10],资源异质性是组织拥有不同类型资源的一个条件,拥有这些资源的组织可以发展竞争优势,而且由于资源具备稀缺性、不易复制性和不可替代性,组织又可长期保持资源优势,开展更多的活动^[26-27]。

将资源类型化是分析资源异质性和非流动性的一个重要方式。由于战略资源论没有统一的企业资源概念和分类,导致资源分类尚未统一标准^[28]。资源观和能力观强调企业掌握的资源和能力是其竞争优势的来源。资源是指企业控制的、能用于实施战略的各种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8];能力是指企业能充分地利用其已有资源,从而协助企业实施战略^[29]。借此概念,将资源划分为有形资源、无形资源和能力3个元素^[30]。有形资源包括金融资产和设施资产,无形资源包括知识产权、组织资产和声誉资产,能力包括技术。

相比之下,创业领域更多观察的是资源的开发过程这一角度^[31]。开发过程包括资源识别、获取、整合和利用。资源识别关注哪些资源对创业活动比较重要,对资源加以评价和细化;资源获取是识别的进一步行动,是对关键资源的搜寻和掌握;资源整合是对关键资源的配置;资源利用则是解决如何让企业保持竞争力的资源协调和调动。然而,创业背景

下的资源类型化研究却很少见。WOOLLEY^[32]认为基础设施资源是新兴技术企业创建的根本, MILLER^[33]强调技术资源对提升企业多元化和竞争力的作用。创业企业需要的资源是多方面的, 按照资源因素在创业战略规划过程的参与度可分为直接参与创业战略制定和执行的资源以及间接提供支持和便捷的资源^[34]。直接参与创业战略制定和执行的资源包括资金、设备等, 间接提供支持和便捷的资源包括技术、信息等。以上讨论的都是本国创业, 国际创业则更多关注依赖母国或进入东道国的网络资源^[35]。尽管创业领域的资源视角强调资源对创业的重要性, 但通常把资源视为一体而不考虑资源类型或使用方式的独特区别, 但是创业企业资源来源具有多样性, 不能只用某一种类型的资源解释。

1.3 企业家认知和创业活动

创业研究正经历一次新的转型和深化, 主流研究开始转向研究企业家认知, 创业活动的独特性并非表现为企业家特质, 而表现为以机会和意愿为中心的企业家认知过程^[5,36]。以认知视角阐明分布在企业家层面上的创业现象, 即研究企业家的思想、精神和推理能力如何导致创业企业在特定的国家或地区诞生的多层次动态问题^[36]。创业认知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 为什么一些人而不是其他人选择成为创业者, 即强调创业意愿; 为什么一些人而不是其他人可以察觉到新产品或服务的机会, 即强调机会警觉^[37]。

创业意愿和机会警觉是企业家对创业活动认知的两种思维判断和决策, 是企业家在对创业理解过程中心理表象和认知结构的升华^[38]。创业意愿旨在创建新企业, 具有相当程度的意愿才能刺激创业行为^[39]。企业家意愿可以通过尝试对基于想法的深层假设来理解^[40], 另外心理模式、认知脚本和图式也揭示了企业家意愿的形成及从意向到行为的过程^[41]。企业家能够敏锐地注意或感知到信息非对称市场上浮现的盈利机会并迅速做出反应的能力, 就称为机会警觉^[42]。机会本质上是价格差异, 机会利润来自套利的可能性^[42], 套利过程能够激励企业家警觉和利用以前没有预见的机会^[43], 并引发企业家的创业行为。机会警觉包括基于一些认知能力和过程的主动立场, 涉及企业家的判断和行动, 拥有警觉性的企业家能够敏锐地洞察创业机会。

创业意愿和机会警觉通常被学者们独立看待, 研究其对创业活动的影响。创业意愿引导企业家的目标设定、沟通、组织及其他工作行为, 虽然行为可能来自潜意识和无意识的牵引, 但结果会导致一个有意识的行为, 即企业的成立^[44]。企业家的意愿决定了组织成立之初的形式和方向, 随着组织的发展、成长和变革, 初始的创业意愿被修改、详细阐述和转化, 最终影响创业的成功^[44]。导致创业活动产生的创业意愿和机会警觉在创业认知角度上交相呼应。TANG et al.^[12]将机会警觉概念化为3个维度: 快速扫描和搜索, 不断扫描环境并寻找新的信息; 对关联的

警觉, 收纳不同的信息并将其组合以建立联系; 对新变化、趋势或新信息做出评估和判断。企业家从线索和收集的信息中串联相互关系, 并从评估中寻找创业的机会。作为诱发创业活动的重要条件, 创业意愿与机会警觉之间存在着关联机制, 但学者们区别看待它们的作用, 至于在驱动创业活动的路径机制中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已有研究中尚未进行充分探讨。

1.4 评述

Timmons 模型^[7]认为资源、机会和创业团队是创业成功的三大因素, 在所处的制度环境下, 企业或组织必须实现三者之间的适配和平衡。PENG et al.^[8]认为制度是创业企业成长必须面对的外界压力, 资源是企业成长不可或缺的积淀。本研究在 Timmons 模型的基础上, 建立基于资源、制度和企业家认知的创业驱动模型。机会是客观存在的且被创业者发觉的^[45], 创业者作为整个团队的核心人物之一, 可以通过机会警觉能力识别环境中潜在的客观机会, 并引导其他成员选择创业。因此, 本研究用企业家认知涵盖创业者的机会警觉能力和创业意愿, 同时保留了 Timmons 模型中的制度和资源因素, 包含了制度、资源和企业家认知3个不同层面的前因驱动因素。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 制度环境、资源禀赋和企业家认知能力均可单方面对创业活动产生影响, 不可否认, 研究某一特定因素对创业活动的作用可以提升研究的准确性, 然而创业活动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导致在实践情景应用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同时, 已有研究大多针对某一国家的情景展开探讨, 然而扩大范围来看, 不同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 甚至文化和制度相接近, 因此归属同一经济体的不同国家在创业活动上存在一些共性, 已有研究并未探讨该类问题。对此, 本研究综合考虑3个在任何国家的创业活动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且具有一定差异的变量作为条件, 基于全球创业观察数据库探讨三者的联动效应对创业活动的影响, 并据此析出驱动创业活动的组态模式。

2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2.1 制度、资源和企业家认知的关联整合

为了维持企业生存和竞争优势, 企业需从环境和其他企业中寻找资源。资源基础观假定制度环境在组织有效管理资源依赖并为获取和维护关键资源而产生的企业之间的权力差异的过程中起重要作用^[46], 通过将制度理论引入资源基础观, 从而形成对企业获取和配置资源的有益补充^[45]。制度环境对新企业创业活动的压力来自获取合法性问题, 合法性地位的提升能够使企业得到社会的认可, 并从环境中获取更多资源。特定制度环境下组织需要合理地进行资源配置, 但具体是哪种类型的资源, 以及他们与制度环境有何关联并未引起太多关注^[45]。

创业活动的开展及创业企业的成长与其拥有的

资源密切相关^[47],新企业的产品技术创新、商业模式突破等很大程度体现在企业家为企业获取有效转变发展方式所需资源的能力上^[48]。ALVAREZ et al.^[4]从企业家认知角度扩大资源基础理论的边界,认为具有创业认知能力的企业家能够识别新机会并为企业配置资源,为企业创造优于市场的异质产出。对创业企业开展活动而言,组织掌握的可利用资源、技术和能力等为企业家提供了选择创建新企业和感知商业机会的优势,成为驱动创业活动的重要来源。尽管资源基础观关注资源的内容类型,创业认知理论强调企业家的认知方式,但少有研究关注企业家的认知方式与组织活动所需的资源类型的联系。

制度框架指出了哪些战略选择是可接受的或受支持的,以此减少组织创建的不确定性^[14]。PENG^[14]认为理解企业家行为对基于制度的商业战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企业家开发和利用商业机会,利用资源改造现有制度或创建新制度,并识别制度蕴含的潜在利益^[49],当具有充足资源的企业家看到有机会实现他们追求的利益时,新的制度就孕育而生^[50]。因此,制度变迁是一个反映组织行为者(企业家)的权力和利益的政治过程^[15]。企业家努力寻找政治机会,解决问题事件,动员选民且尝试为社会结构注入新的信念、规范和价值^[20]。已有研究强调了企业家在面对制度时能动与嵌入的双向行为反应,但对某一制度存在或缺失、可与何种存在或缺失的企业家认知方式捆绑这一问题未给予专门的解释。

整合制度理论、资源基础观和创业认知理论可以有效地回答:如何协调制度环境、资源状况与企业家认知的不一致状态,以维持三者的协调和平衡,从而实现创业活动的成功。企业的生存和成长嵌入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中,企业家理解和认知所处的制度环境并做出决策是很重要的^[14]。然而,资源的差异性又使企业家面临在制度压力下如何配置资源的问题^[51],即企业需要何种类型的资源。同时囿于制度和资源的影响,企业家需要充分理解两方面的内部关键因素,以推动或辅助企业家在利用个体认知能力的基础上开展创业活动。综合看,只有系统整合三方面,才能更好地解释驱动创业活动实现的路径模式。

与以往学者对创业活动的研究不同,摒弃了从单一视角或二元交互角度的分析方式,本研究从整体论视角出发,考察驱动创业活动并导致不同创业活动特征的制度、资源和企业家认知3个因素。尽管周键^[52]从组织层面的资源基础观和个体层面的创业者特质视角也识别出促使创业企业成长的构成因素,但仅观察到创业者特质的不同和利用资源的能力导致的创业差异,未考虑企业的资源禀赋与创业者发起的创业活动嵌入在制度层面的现实条件,这是对基于实现创业活动的多元因素的综合性考察的缺失。某一事件的驱动模式不是由孤立的组件形成的模块化或松散耦合的形态,应理解这些组件之间是相互关联的、聚合的^[53]。创业活动的成功是相关

因素组合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FOGEL^[54]认为,免税或财政补贴、低成本长期负债资助等规章制度,设备、技术、管理信息系统等物质资源,以及企业家精神等个体特质,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创业活动的进展。

由此得知,驱动创业活动的因素具有多样性,需要综合测量其价值组合效应,单一式或加总式的关系链条在实现创业活动的过程中并不适用。考虑到制度、资源和企业家认知之间的组合性,实现创业活动的驱动模式应该是对三大因素的综合考察并进行组合分析。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

H₁ 如果创业活动驱动模式是单一的或加总的或交互的,可以根据制度、资源和企业家认知3个方面的组合性,利用组合模式对创业活动驱动模式进行分析。

2.2 制度、资源和企业家认知的组合效应

创业活动是一个复杂的现象,涉及各种背景和因素^[55]。对任何一个开展创业的国家或地区来说,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或增加就业的创业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创业活动特征。不同国家在创业活动的活跃度上差异很大,且创业活动的成长性和创新性因国家经济水平差异而存在区别^[56]。创业活动的程度表现为法人或非法人企业的所有者或管理人员相对于劳工的比例,即创业率,此比例在各国之间差异很大^[57],这种差异来自多方面的影响,“全球创业观察(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GEM)”的年度报告从创业活动率、创业动机、个体属性和创业环境框架等方面给出了导致该差异的一些因素。参照GEM的年度报告的框架结构分析方法,本研究重点从制度、资源和企业家认知3个层面解释实现创业活动的驱动模式。

对任何实践创业活动的企业来说,创业活动的不同结果特征,即活跃性和创新性,受到特定制度环境、既有资源状态和企业家认知的多重因素影响。理论上说,创业活动的不同结果特征是基于多元情景的思考。FOGEL^[54]对经济支持、非经济支持、创业和商业技能、社会经济条件、政策和制度5个方面因素下创业活动活跃度进行数据验证,认为激发创业活动活跃度是一系列因素组合的结果;张玉利等^[58]基于动机属性、知识属性和能力属性的创新性评价体系对创业活动质量进行理论分析,认为增强创业活动创新性需要综合考虑多因素的组合效应。承袭这一观点,在兼具制度、资源和企业家认知的创业大环境下,创业企业呈现出创业活动数量激增和创业活动质量提升的结果特征,这是在3种因素不同组合效应下的组合效果。

实践表明,在不同因素的存在或缺失、强或弱的综合作用下,各因素组合效应导致不同程度的创业活动。一方面经济行为受到显性、强制的正式制度的约束,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隐性的、非正式制度的影响^[16,59]。已有研究^[25]认为制度影响创业活动的活跃度和类型,且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

不同程度上调节拥有资源禀赋的企业家开展创业活动^[60]。上述观点表明制度在制度、资源和企业家认知共存状态下的主轴作用对创业活动的影响十分重要。因为,政府的金融或税收政策为企业家的创业活动提供物质保障,社会对创业的认可和支持也有利于企业家创业,它们共同为创业活动提供一种合法性、规范性的认同。

创业企业需要考虑创业资源、创业者特性和创业制度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以提升机会识别数量和机会开发创新度。基于资源基础观的资源束强调具有价值、稀缺及难以模仿的资源是企业竞争的关键^[10],而新创企业不具备完整类型化的资源,往往通过对资源进行组合来推动创业行动^[47]。上述观点突出了资源在3个因素关联作用中的重要性,对核心资源的有效配置可以促进创业活动的实现。其中,基础设施是企业家开始和发展创业活动的物质基础,研发环境和技术则可以推动新企业开展更高创新性的创业活动。

认知视角的创业活动研究是在制度情景与因素资源配置二元影响下诱发的,反映企业家思维过程的选择、判断、推理和决策的机制过程^[38]。创业活动的产生是企业家主动选择追求他们已经确定的机会,成为企业家的决定是最初和关键的一步^[59],一旦企业家拥有创业的想法或意愿,会进一步诱发其创业行为。且对非均衡市场环境有独特警觉性的企业家可以敏锐地发觉市场隐含的机会和信息^[61],他们对创业活动拥有独特的准备,通过利用经验、认知模式和信息处理技能等将这种机会警觉作用扩大,以实现创业。上述观点强调企业家认知在三者间具有协调性的关键作用,选择创业和察觉机会可以有效开展创业活动。因为,具有创业意愿和机会警觉的企业家能够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中发现开发新产品、新服务或新模式的机会,促进创业活动。

综上所述,制度、资源和企业家认知的不同组合方式导致系统整体效应的差异性,为了识别构成因素在系统整体中的重要程度,以及哪些因素组合对引致结果存在的是主导性的或辅助性的,还是无关紧要的^[62],创业活动的驱动模式需要根据不同因素组合情况采用差异化的组合方式。创业企业需要摒弃受制于某一特定情景的认知习惯,从影响创业实现的整体视角出发,根据实现不同程度创业活动的使命目标和对情景的不同认知而组合与之匹配的效应最大化的条件。例如,在特定的情景下,创业意愿会驱使企业家考虑开展创业活动^[63],激发创业活动的活跃度;资源束是企业构建竞争优势的基础^[47],作为满足成长和竞争需要的资源条件促进创业企业实现高质量的创业活动。

对在不同国家或地区开展创业活动的企业来说,由于其所处的制度环境的特定背景、拥有的或可获得的资源情况,以及企业家具体的认知能力存在差异,导致存在多种可引致创业活动实现的路径模式,甚至引致同一创业活动特征的路径模式中存在

互补或替代的组合特征。尽管需要从整体角度考察因素的综合效应,但并不意味着每个条件同等重要,组态模式中存在核心因素和辅助因素^[64]。核心因素是决策者需关注的重点因素,辅助因素是辅佐核心因素发挥作用的要素。特别的,在创业活动的驱动组态模式中,还需突出关键因素的首要地位^[65]。凸显引致创业活动的关键因素,有助于企业家把握主线并取得预期的行为结果。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

H₂ 制度、资源和企业家认知因素之间差异化组合且突出核心因素的形式,可以实现不同特征的创业活动驱动模式。

3 研究方法

3.1 样本选择和数据收集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全球创业观察数据库,该项目由美国百森商学院和英国伦敦商学院共同发起并创建,是一个跨国家、跨地区的,旨在研究全球创业活动态势的大型研究项目。2002年,中国作为项目成员加入该研究团队,中国的GEM调查是由清华大学创业管理中心主持完成的。GEM的调查目的是提供一个数据库来研究创业活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复杂关系,并促进以数据为基础的创业活动研究^[66]。

本研究选取2012年至2016年之间的GEM数据,数据来自成人人口调查(adult population survey, APS)和国家专家调查(national expert survey, NES),社会价值观、创业意愿、机会警觉、早期创业活动、成熟期创业活动、高期望创业活动和高创新创业活动的指数均来自APS,政府政策、文化和社会规范、基础设施、R&D转化的指数均来自NES。本研究的经济体划分依据来自《全球竞争力报告》(world economic forum, WEF)。经过筛选,有87个国家或地区包含以上所有指标,其中,要素驱动经济体20个,效率驱动经济体38个,创新驱动经济体29个。

3.2 研究方法选择

创业活动是一个复杂的实现过程,是制度、资源和企业家认知等交互的结果。这就需要我们用一种整体性的分析视角,从多方交互的作用过程中析出实现创业活动活跃性和创新性的关键成分。组态分析基于条件变量相互依赖的假定,侧重于研究条件变量间的组合如何在组态层面发挥作用^[67]。创业活动并不是由多个单项条件分别作用产生的,而是由多个单项条件相互作用产生的。因此,本研究未选择以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关系为基础的多元回归分析方法,而是采用基于组态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分析制度、资源和企业家认知的组合作用,并揭示这种复杂的因果关系。

(1)如前文所述,驱动创业活动实现的各变量间存在组合效应。根据本研究的研究框架,创业活动作为结果变量,其实现的条件为制度、资源和企业家认知3个方面,且每一方面包含多个变量,由于各个

变量之间存在相互依赖关系,哪些变量的组合效果更佳是一个需要探索的问题。传统的回归分析重点讨论单个变量的净效应,交互功能揭示2~3个变量间的交互作用,对多个变量的交互效应分析就很困难。因此,传统的聚焦线性和单向的多元回归分析无法更好地阐释3个变量以上的组合效果,而定性比较分析将各个单项因素视作组合条件,且有效地处理多个变量的交互效应,以探究结果变量实现的相似或相异组态^[53]。组态分析比线性分析更有助于把握不同条件之间交互作用的真实效应,更有助于从整体而非单向角度解释创业活动。

(2)在分析制度、资源和企业家认知组合驱动创业活动实现的过程中,其考虑实现创业活动数量或质量的组态时关注的因素也会有别于其考虑未实现创业活动数量或质量的组态时关注的因素。同一个因素组合的存在,既可能是引致结果变量产生的路径,也可能是引致结果变量未产生的路径,其补集不一定是引致结果变量未产生的必要条件。按照集合论的表述创业活动质量的实现存在非对称性,传统基于通用视角的统计方法遵循线性对称关系,而定性比较分析则立足于条件与结论的非对称性^[67]。例如,创业意愿存在以 EI 表示,不存在以 $\sim EI$ 表示,创业意愿对应的创业活动质量的实现以 EAQ 表示,未实现以 $\sim EAQ$ 表示。依照多元回归方法会得到 $EI \rightarrow EAQ$ 、 $\sim EI \rightarrow \sim EAQ$ 。然而,实际上并不一定意味着 $\sim EI \rightarrow \sim EAQ$ 。

(3)区别于统计分析和案例分析的样本量限制,定性比较分析既可处理小样本案例,也可分析大样本数据,其分析结果具有整体样本的代表性。综合定性与定量优势的定性比较分析的定量思想体现在测量各个单项前因的指标,从而决定在某一集合中的分位数值,而定性思想体现在分位数值决定了单向前因隶属于哪一集合。例如,正式制度的25%分位数值2.180是完全非隶属度,50%分位数值2.460是交叉点,75%分位数值2.713是完全隶属度。

(4)定性比较分析能够分析哪些条件是结果变量的充分或必要条件并对逻辑关系进行梳理。区别于统计分析方法假定的每个前因变量是结果变量的充分且必要条件,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认为单个前因变量或前因变量组合可以是充分的、必要的、充分且必要、既非充分又非必要,甚至在极端条件下(既非充分又非必要)仍可具备隶属关系^[68]。定性比较分析主要采用一致率和覆盖率表示充分性和必要性,一致率描述了充分条件的非对称程度,覆盖率解释了某一组态作为引致结果变量路径的唯一性程度。

3.3 变量定义和赋值

(1)经济体划分

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报告》根据人均GDP和初级产品占出口份额的情况,把经济体分为要素驱动型经济体、效率驱动型经济体和创新驱动型经济体3个类别。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分类,要素驱动型经济体主要是自给农业和开采业务,严重依

赖非技术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效率驱动型经济体是在效率驱动阶段,随着更高效的生产过程和更高质量的产品质量,经济体更具竞争力;创新驱动型经济体是进入创新驱动阶段,知识密集型企业占据主导,且服务部门进一步扩大。

(2)制度层面的代理指标

新制度学派在概念上区分了认知和规范维度,但是很难从实证上进行区分^[9],主要是因为文化认知的演变过程非常漫长^[69],难以找到充分的证据。因此,本研究遵循诺斯^[16]的分类方法,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方面测量制度。

正式制度主要包括国家的法律、法规等,本研究选取政府政策指标测量正式制度。政府政策是指国家或地区的政策、规章、税收等制度在多大程度上鼓励企业家创业。GEM对政府政策的测量选取政府支持和政策、税收和官僚主义这两个标准,本研究选取这两个标准的均值作为政府政策的测量指标,以 FI 表示。

非正式制度主要是以非正式形式存在的价值观、信仰和文化等,本研究选取社会价值观以及文化和社会规范两个指标测量非正式制度。社会价值观的测量包含社会尊重和公众认可两个标准,社会尊重即认为成功企业家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地位并受人尊敬,公众认可即认为创业是一个理想的职业选择。文化和社会规范是指文化和社会规范在多大程度上鼓励或允许创业行为。本研究选取社会价值观与文化和社会规范指标之和作为测量指标,以 IFI 表示。

(3)资源层面的代理指标

借鉴GALBREATH^[30]对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的划分标准,本研究选取基础设施和R&D转化测量资源。基础设施是指可利用的有形资源的数量和获取的难易程度,有形资源如通信、公用事业、交通运输、土地等,以 INS 表示;R&D转化是指研发将在多大程度上创造新的商业机会,并供企业所用,以 RD 表示。

(4)企业家认知层面的代理指标

创业活动是企业家不断进行创业认知的结果,本研究从企业家为什么选择创业和为什么有的企业家能够创业两个角度,选取创业意愿和机会警觉作为测量指标。GEM将创业意愿界定为在18岁~64岁的群体中,作为潜在创业者并打算在3年内创业(不包括参与任何创业活动阶段)的人群比例,以 EI 表示;将机会警觉界定为在18岁~64岁的群体中,处于任一创业活动阶段,并发现创业机会的人群比例,以 OA 表示。

(5)创业活动的代理指标

创业活动是一个多维度、多层面的复杂现象,用多指标的测量方法更适合研究创业活动^[54]。借鉴赵向阳等^[36]对创业活动的测量,本研究选取创业活动数量和创业活动质量分别测量创业活动的活跃性和创新性。

创业活动数量。根据GEM的定义,早期创业活

动指数是指18岁~64岁的群体中,参与创建企业或运营企业时间少于42个月的个体数量在成年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成熟期创业活动指数是指在18岁~64岁的群体中,拥有并自主管理一家成熟公司且创立时间超过42个月的个体数量在成年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本研究选取早期创业活动指数和成熟期创业活动指数的均值作为创业活动数量的测量指标,以EAT表示。

创业活动质量。根据GEM的定义,高期望创业活动是指在早期阶段创业群体中,期望未来5年内雇员数量增加到20人以上的创业者比例。高创新创业活动是指在早期阶段创业群体中,认为自己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对消费者而言是新颖的,并且很少有企业提供同类产品或服务的创业者比例。本研究选取高期望创业活动和高创新创业活动的均值作为创业活动质量的测量指标,以EAL表示。

对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基础设施、R&D转化、创业意愿、机会警觉、创业活动数量和创业活动质量8个指标采用平均化处理方法,保证数据的稳定性和信度。对于某一特定集合的隶属度,需要通过校准来实现。具体来说,本研究通过对制度、资源和企业家认知因素的模糊校准分析三者的组合作用。根据已有的模糊校准研究^[70],选取各变量在25%、50%和75%分位数值作为完全非隶属度、交叉点和完全隶属度,模糊集隶属度代表不同案例属于某集合的程度,75%分位数值代表完全隶属于某一集合,25%分位数值代表完全不隶属于某一集合,50%分位数值为是否隶属于或不隶属于一个集合时的最大模糊点。这3个标准用于将原始变量数值转化为模糊隶属度数值,以此进行fsQCA分析。表1给出各变量的校准情况。

3.4 分析步骤

依据定性比较分析的数据分析规则,首先,本研究进行必要性分析,目的是检验是否是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以及是否要进行组态分析。其次,本研究通过组态分析识别能够导致结果变量发生的多条路径,从而验证 H_1 和 H_2 ,同时进行稳健性检验进一步加强结果的可靠性。最后,根据组态分析的结果,本研究解析创业活动的驱动模式、不同经济体的创业活动特征、创业活动数量到质量的特征转变,并提出命题。

4 数据分析结果

4.1 必要条件分析

本研究使用fsQCA 3.0软件分析87个案例国家(地区)的创业活动数据,识别出引发高创业活跃性和创新性的组态。借鉴FISS^[64]的研究,将一致性阈值设定为0.800,案例阈值设定为1。

表2给出创业活动的必要性检验结果,由表2可知,所有单项条件对创业活动数量或质量的一致率均未超过0.900,不构成必要条件。检验结果表明,单项条件对结果变量的解释力较弱,即制度、资源和企业家认知条件需要相互间的联动匹配才能共同影

表1 变量校准
Table 1 Variables Calibration

变量	校准参数	分位数值
FI	完全非隶属度(25%)	2.180
	交叉点(50%)	2.460
	完全隶属度(75%)	2.713
IFI	完全非隶属度(25%)	63.258
	交叉点(50%)	70.030
	完全隶属度(75%)	78.048
INS	完全非隶属度(25%)	3.400
	交叉点(50%)	3.770
	完全隶属度(75%)	4.057
RD	完全非隶属度(25%)	2.035
	交叉点(50%)	2.276
	完全隶属度(75%)	2.558
EI	完全非隶属度(25%)	12.174
	交叉点(50%)	19.704
	完全隶属度(75%)	33.360
OA	完全非隶属度(25%)	33.620
	交叉点(50%)	44.323
	完全隶属度(75%)	55.875
EAT	完全非隶属度(25%)	6.410
	交叉点(50%)	8.668
	完全隶属度(75%)	12.508
EAL	完全非隶属度(25%)	16.750
	交叉点(50%)	22.886
	完全隶属度(75%)	27.974

响创业活动。因此,本研究需要将各个单项条件纳入fsQCA进行组态分析。

4.2 创业活动的组态分析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会析出复杂解、简洁解和中间解3类解,借鉴FISS^[64]的研究,本研究同时报告简洁解和中间解,并将同时出现在这两类解中的条件作为核心条件,仅出现在中间解而未出现在简洁解中的条件作为辅助条件。

(1) 创业活动数量的组态分析

表3给出创业活动数量组态特征,低阶组态为每一条中间解,高阶组态为拥有相同核心条件的低阶组态。由表3的结果可知,共有7个高阶组态可以提

表2 创业活动的必要性检验结果
Table 2 Necessity Test Results for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条件	一致率		覆盖率	
	EAT	EAL	EAT	EAL
FI	0.505	0.617	0.498	0.596
~FI	0.579	0.461	0.587	0.459
IFI	0.669	0.479	0.665	0.467
~IFI	0.414	0.596	0.416	0.588
INS	0.496	0.687	0.472	0.641
~INS	0.610	0.413	0.642	0.427
RD	0.450	0.656	0.447	0.640
~RD	0.635	0.426	0.638	0.420
EI	0.760	0.469	0.772	0.468
~EI	0.346	0.611	0.340	0.589
OA	0.728	0.462	0.744	0.464
~OA	0.391	0.651	0.382	0.625

高创业活跃性, C₁、C₄、C₅均具有2条及以上的低阶组态,表现了殊途同归的特征,7个高阶组态的总体一致性为0.850,大于0.800的阈值,总体覆盖率为0.748。

根据7个高阶组态的核心条件所展现的因素组合特征,本研究总结出5个创业活动数量驱动模式,其中, C₂和C₃在条件构成上存在差异,但C₂和C₃反映的解释逻辑一致,因此合并考虑^[71]。同理, C₅和C₆也合并考虑。5个模式的具体分析如下。

C₁为模式1,其特点是以创业意愿和机会警觉为核心条件存在。在c_{1a}~c_{1c}的低阶组态中,又出现辅助条件缺失或存在的复杂情况。具体来说,企业家强烈的创业意愿和高度的机会警觉是驱动创业活动数量的核心因素,同时, c_{1a}和c_{1b}显示非正式制度作为辅助性条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创业活动。模式1揭示了企业家认知能力在因素组合中的主导作用,创业活动活跃性的提升需要企业家拥有选择创业的想法和意愿,且具有敏锐发现市场中隐藏的商机的能力会促使其开展创业活动,社会和民众对创业行为的认可又进一步推动创业率的提高。模式1的样本国家主要包含要素驱动型经济体的非洲地区,如安哥拉(c_{1a})、利比亚(c_{1b})、加纳(c_{1c})。

C₂和C₃为模式2,其特点是以机会警觉为核心条件存在且非正式制度为核心条件缺失。尽管C₃也显示了R&D转化不存在的情形,但C₂中R&D转化可存在、可不存在,说明R&D转化缺失并不是模式2实现

表3 创业活动数量组态
Table 3 Configur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Quantity

条件	C ₁			C ₂	C ₃	C ₄			C ₅		C ₆	C ₇
	c _{1a}	c _{1b}	c _{1c}	c ₂	c ₃	c _{4a}	c _{4b}	c _{4c}	c _{5a}	c _{5b}	c ₆	c ₇
IF				⊗		●		⊗	●	●	●	⊗
IFI		●	●	⊗	⊗		⊗	⊗	●	●	●	●
INS	⊗		⊗	⊗	●	●	●		●		⊗	●
RD	⊗	⊗			⊗	●	●	●	●	●	●	⊗
EI	●	●	●	⊗	⊗	●	●	●		●	●	●
OA	●	●	●	●	●	⊗	⊗	⊗	⊗	⊗		
CS	0.917	0.906	0.860	0.874	0.924	0.848	0.852	0.875	0.813	0.895	0.835	0.900
CV	0.387	0.404	0.396	0.078	0.072	0.133	0.112	0.102	0.124	0.102	0.122	0.135
NCV	0.053	0.035	0.045	0.015	0.021	0	0.003	0.012	0.038	0.001	0.006	0.014
OCS	0.850											
OCV	0.748											

注: CS为一致性, CV为覆盖率, NCV为净覆盖率, OCS为总体一致性, OCV为总体覆盖率, C为高阶组态, c为低阶组态, ●为核心条件存在, ●为辅助条件存在, ⊗为核心条件缺失, ⊗为辅助条件缺失, 空白表示组态中该条件可存在、可缺失, 下同。

的必要条件。因此,结合案例样本(样本在 C_2 和 C_3 中均存在),本研究针对共同具备机会警觉和非正式制度这两个核心条件的 C_2 和 C_3 进行讨论,目的是从特殊中分析普遍特征^[72]。

在非正式制度严重缺失时,社会对创业活动的认同度低且民众不认为创业是一种职业选择,甚至民众认为创业是一种高风险性的职业。由于正式制度也不健全,企业家的创业活动无法获得政策支持。此时强调,具有高水平的察觉商机能力的企业家,能够敏锐地洞察处在市场、政府政策等竞争夹缝中的机会。机会是激发创业活动的核心因素^[5],识别、利用和开发机会可以有效提升创业活动的活跃度。模式2的样本国家主要包含效率驱动型经济体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如墨西哥(c_2)、巴拿马(c_3)。

C_4 为模式3,其特点是以R&D转化和创业意愿组合为核心条件存在。另外,机会警觉作为辅助条件均缺失,表明企业家对机会的感知能力较弱。但良好的R&D转化环境为开展创业活动创造了技术条件,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机会趋于饱和,此时主要依赖企业家的创业意愿,企业家利用既有的研发条件,面对失稳的制度环境采取操纵或创造战略开展创业活动。模式3的样本国家主要包含效率驱动型经济体的东欧地区,如立陶宛。

C_5 和 C_6 为模式4,其特点是以非正式制度和R&D转化为核心条件存在。另外,正式制度的辅助效应较强。由于 C_6 中机会警觉可存在、可不存在,在遵从上文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以共有的核心因素作为分析单位。根据fsQCA析出的结果,模式4主要包括效率驱动型经济体的亚洲和大洋洲地区,如中国(C_5)、中国台湾(C_5 、 C_6)。以中国为例,国家的科技创造和科技转化的实力日益显现,为创业活动提供优良的研发环境。随着“双创”政策对创业活动的鼓励和支持以及一批企业的成功实践获得民众对创业的认同,多种因素的综合反映结果是创业活动的不断发展。

C_7 为模式5,其特点是以正式制度为核心条件缺失、非正式制度和企业基础设施为核心条件存在。具体来说,国家对创业的政策扶植力度严重不足,甚至缺失,然而一批拥有基础设施的企业可凭借资源禀赋优势发展创业活动,此外社会民众对创业活动持认同态度,这些因素导致企业家的创业行为。由于fsQCA软件默认寻求最大的覆盖率,因而可能导致软件将细微的差异放大^[73]。 C_7 的净覆盖度为0.014;模式1中 c_{1a} 的净覆盖度最大,为0.053;模式2中 c_3 的净覆盖度最大,为0.021;模式4中 c_{3a} 的净覆盖度最大,为0.038。模式5的最大净覆盖度小于模式1、模式2和模式4,仅存在一种组态且无法与其他低阶组态结合讨论,说明其解释度较低。实际中,模式5对应的样本国家(如埃及、厄瓜多尔、危地马拉和伊朗)均存在一定程度的政府政策支持。因此,本研究综合考虑fsQCA默认结果和解释度与实践相关性之间的关系,遵从理论切题性的原则^[67],本研究在接

下来的分析中不再讨论模式5。

(2) 创业活动质量的组态分析

表4给出创业活动质量的组态特征。由表4可知,仅有1种组态可以解释增强创业活动质量的组合效果,其总体一致性为0.832,大于0.800的阈值,总体覆盖率为0.354。

表4 创业活动质量组态

Table 4 Configur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Quality

条件	C_8	条件	C_8
<i>IF</i>		<i>CS</i>	0.832
<i>IFI</i>	⊗	<i>CV</i>	0.354
<i>INS</i>	●	<i>NCV</i>	0.354
<i>RD</i>	●	<i>OCS</i>	0.832
<i>EI</i>		<i>OCV</i>	0.354
<i>OA</i>	⊗		

具体来看,模式6(即 C_8),其特点是以基础设施和R&D转化组合为核心条件存在,而非正式制度和机会警觉为核心条件缺失,从中可以看出,资源是企业能够实现高成长性和高创新性创业活动的重要所在。根据fsQCA析出的结果,模式6包含创新驱动型经济体的欧洲中西部地区和东亚地区,如瑞士、法国、日本。这类国家为企业提供完备的基础设施资源,可利用的有形资源数量多,且国家整体的科技水平高,研发实力强,为创业的深入发展提供物理设施和研发技术的支持。

包含在该组态的多为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拥有大批成熟的创业企业。国家开展创业活动的目的不再是关注数量的增加,而是重视创业活动的高质量发展。特别是以母公司为依托,发展公司内创业或跨国创业,重视企业未来的成长性和创新性。以新的形式呈现的创业行为必然会通过引入一种与现有社会结构相矛盾的新产品、新服务或新模式以获得社会和民众的认可。并且,稳定的市场和生产环境不仅为创业活动提供充足的资源,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可供企业家开发新市场的机会的概率,使企业家更依赖于既有资源的优势去发展创业活动。模式6揭示了在驱动创业活动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资源条件为企业提供进一步拓展的基础设施平台以及深度发展的研发技术环境的重要作用。

通过对创业活动组态的分析可以看出,创业活动的每一条低阶组态是制度、资源和企业家认知三方面组合作用的结果, H_1 得到验证。表3和表4中的高阶组态突出了核心因素的重要性,并且每一种模式都具有其特有的特征, H_2 得到验证。

4.3 稳健性检验

由于定性比较分析的某些组态可能仅有少量观察样本,甚至只有1个样本,因而出现需要通过反事实分析未观察到的样本进行判定的情况,因此,一些学者质疑QCA结果的稳健性^[74]。BELL et al.^[75]认为检验稳健性有两种方法,一是加入已有研究的可成立的影响因素,如果增加了这些影响条件未对组态结果产生较大影响,且研究结果与假设一致,则证实了研究结果的可信性;二是在对引致结果变量高水平的因素进行组态研究的同时,也对结果变量低水平的因素进行组态分析,如果出现某一因素既能导致结果变量的高水平又能导致结果变量的低水平,则认为它不应是结果变量高水平的充分条件。本研究采取第一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本研究对创业活动数量和质量的组态采取增加影响条件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已有研究认为,创业行为的产生受创业者的动机驱动,应关注企业家是由于偏好主动还是被迫选择而进行创业活动^[76]。因此,本研究选取GEM成人数据库中的创业动机为添加条件进行原命题的再验证。GEM将创业动机定义为,由机会动机驱动的创业活动除以生存动机驱动的创业活动的比例,比例大于1为机会型创业动机,小于1为生存型创业动机,以EM表示。

表5给出创业活动数量组态的稳健性检验结果,由表5可知,存在8种高阶组态解释创业活动数量,其总体一致性为0.862,大于0.800的阈值,总体覆盖率为0.732。与表3的高阶组态数量特征相似,且一致性和覆盖率差异较小,证实了组态结果的可靠性。

对比表3,总体来看,表5中的高阶组态Z₁的特点为创业意愿和机会警觉作为核心条件存在,与C₁一致;高阶组态Z₃的特点为以机会警觉作为核心条件存在,与C₃和C₄一致;高阶组态Z₄的特点为以R&D转化和创业意愿作为核心条件存在,与C₄一致;高阶组态Z₅和Z₆的特点为以非正式制度和R&D转化作为核心条件存在,与C₅和C₆一致。同时,表5低阶组态的条件存在或缺失状态与表3基本一致,因此,表3的稳健性得到证实。值得注意的是,Z₂是加入创业动机前不存在的组态,Z₂的特点是以正式制度、创业意愿和机会警觉作为核心条件存在。本研究遵循条件最少的前提下剔除重复覆盖的原则^[77],将Z₂与Z₁共同视为一种模式,即强调企业家认知的关键作用。Z₇和Z₈作为表3中C₇的变形,承接上文原则,在此不再讨论该模式。

表6给出创业活动质量组态的稳健性检验结果,由表6可知,存在5种高阶组态可以解释创业活动质量,其总体一致性为0.850,大于0.800的阈值,总体覆

表5 创业活动数量组态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le 5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for Configur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Quantity

条件	Z ₁			Z ₂		Z ₃		Z ₄		Z ₅		Z ₆	Z ₇	Z ₈
	z _{1a}	z _{1b}	z _{1c}	z ₂	z _{3a}	z _{3b}	z _{4a}	z _{4b}	z _{5a}	z _{5b}	z ₆	z ₇	z ₈	
FI				●	⊗		⊗		●	●	●	⊗	⊗	
IFI	●	●	●	●	⊗	⊗	⊗	⊗	●	●	●	●		
INS	⊗	●	⊗	⊗	⊗	●		●	●		⊗		●	
RD	⊗	⊗		⊗		⊗	●	●	●	●	●	⊗	⊗	
EI	●	●	●	●	⊗	⊗	●	●		●	●		●	
OA	●	●	●	●	●	●	⊗	⊗	⊗	⊗		●	●	
EM	●	●	●		●	●	●	●	●	●	●	●		
CS	0.930	0.921	0.886	0.929	0.881	0.923	0.905	0.849	0.825	0.921	0.847	0.881	0.911	
CV	0.341	0.340	0.349	0.152	0.071	0.067	0.095	0.093	0.119	0.096	0.114	0.280	0.115	
NCV	0.053	0.012	0.044	0.015	0.015	0.021	0.020	0.014	0.037	0.001	0.006	0.027	0.017	
OCS							0.862							
OCV							0.732							

注:Z为高阶组态,z为低阶组态,下同。

表6 创业活动质量组态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le 6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for Configur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Quality

条件	Z_9	Z_{10}	Z_{11}		Z_{12}		Z_{13}
	z_9	z_{10}	z_{11a}	z_{11b}	z_{12a}	z_{12b}	z_{13}
FI		⊗	⊗	⊗	●	●	⊗
IFI	⊗	⊗	⊗	●	●	●	●
INS	●	●	⊗	⊗	⊗	⊗	⊗
RD	●		⊗	⊗	⊗	⊗	●
EI		⊗	⊗	●	⊗	●	●
OA	⊗	⊗	⊗	⊗	⊗	●	●
EM	●	●	⊗	⊗	⊗	⊗	⊗
CS	0.838	0.842	0.928	0.891	0.911	0.965	0.890
CV	0.340	0.164	0.021	0.027	0.022	0.026	0.028
NCV	0.211	0.035	0.017	0.012	0.013	0.009	0.013
OCS				0.850			
OCV				0.461			

盖率为0.461。与表4的一致性和覆盖率差异较小,证实了组态结果的可靠性。

对比表4,表6存在5类高阶组态,根据fsQCA的结果,当创业动机存在时,为机会型创业动机;当创业动机不存在时,为生存型创业动机。因此,表6的 Z_9 和 Z_{10} 为机会型创业动机, Z_{11} 、 Z_{12} 和 Z_{13} 为生存型创业动机。在表6中, Z_9 的特点为以创业动机、基础设施和R&D转化作为核心条件存在。 Z_{11} ~ Z_{13} 则显示生存型创业动机的国家为实现创业活动质量缺乏必须的基础设施和R&D转化。综合看, Z_9 的净覆盖率最高,为0.211,说明此种类型的国家在样本中占比最多,具有较高的代表性,从而表4创业活动质量的稳健性得到证实。

Z_9 和 Z_{10} 主要包括创新驱动型经济体, Z_{11} ~ Z_{13} 则包含了处于不同地理位置的效率驱动型经济体。效率驱动型经济体包含众多国家,因此正式制度多样,企业资源因创业环境而异,机会警觉能力也各不相同,但该类经济体国家多处于转型或快速发展阶段,政府政策对创业活动给予扶持(如 Z_{12})。效率驱动型经济体表现的一大特征是以生存型创业为动机,受制于基础设施资源的缺乏(如 Z_{11} ~ Z_{13})及研发环境或技术转化的不足(如 Z_{11}),生存型创业从事的多为技术壁垒低、不需要很高技能的创业活动。尽管 Z_{11} ~ Z_{13} 展现了实现创业活动质量的一类组态特征,但其创业动机低,创业质量低,从5个低阶组态的净解释

度也可看出,其代表样本少。因而 Z_9 最具解释力度,证实了表4的稳健性。

5 研究发现和讨论

5.1 驱动模式分析

在定性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对表3和表4的结果做进一步分析,以对不同国家(地区)的创业活动驱动模式的组合元素、组态特征以及创业活动的量-质转化等有更深入的把握。

(1) 创业活动模式分析

引导建立创业企业和开展创业活动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实现,由于企业面临的制度环境相对复杂,同时还要考虑自身的资源状况,因此创办新企业面临的主要阻力来自于是否察觉到市场中存在的不均衡信息和机会,以及是否选择创业。在此情况下,开展创业活动需要具有机会警觉能力和\或创业意愿的企业家进行引导。也正因如此,在驱动创业活动数量的6个高阶组态中(C_7 不纳入讨论),企业家层面的创业意愿和机会警觉表现出主导作用,即在6个高阶组态中,含创业意愿或机会警觉的高阶组态占4个。同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的R&D转化环境也是促进开展创业活动的一大关键,即含R&D转化的高阶组态占3个。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的落地,不仅为创业企业提供了研发技术上的支持,也为其创造了新的商业机会,打通了开启创

业活动的一扇创新之门。在制度环境的表现强度上,非正式制度显示的民众认可和支持为开展创业活动带来合法性,然而其对创业活动更多是辅助性影响。

企业家认知能力是影响创业活动活跃度的主要因素,企业的R&D转化环境为企业把握机会动向并开展创业活动创造了条件。因此,创业活动数量实现的模式可概括为企业家认知驱动型,即企业家认知能力起主导作用,R&D转化是企业家引导的重要工具,制度环境是实现企业家引导的辅助因素。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命题1a。

命题1a 在特定的情景下,具有机会警觉,非正式制度与R&D转化组合、创业意愿与机会警觉组合、创业意愿与R&D转化组合3种模式的创业企业,能够实现创业活动活跃性的提升,即提升创业活动数量。

自开始创业活动后,创业企业担负着如何提升企业竞争力、成长性和创新性的使命,这时创业企业选择在成长向成熟过渡阶段推行新产品、新服务或新模式,以实现商业模式转型。该过程依旧面临着制度的多样性挑战,且企业家个人认知能力的主导作用下降,此时企业家开始思考,如何动用既有资源发展更高质量的创业活动。当今时代的经济表现为科技创新引领格局,拥有丰富异质性资源的创业企业更具有成本优势和能力进一步开展创业活动。也正因如此,在驱动创业活动质量的组态中,资源层面的基础设施和R&D转化表现出主导作用。独具且有价值的资源有助于企业产生竞争优势^[78],未被广泛拥有的基础设施资源和不易被复制且能够提升企业效率及创新的R&D转化技术,是提高创业活动质量的重要保障。基于以上分析,创业活动质量实现的模式可概括为资源驱动型,即创业企业的资源条件起主导作用,企业家认知能力、制度环境有影响且发挥辅助作用。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命题1b。

命题1b 在特定的情景下,依赖于资源层面的基础设施和R&D转化的组合模式的创业企业,能够实现创业活动创新性的提高,即提高创业活动质量。

(2) 不同经济体的对比分析

GEM历年的研究报告向我们提供了一个信息,在发展中国家,创业活动的数量很大,但创业活动的质量较低;而在发达国家,创业活动的数量比较小,但是创业活动的质量比较高^[56]。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意味着国家(地区)所拥有的可以激活创业活动的的能力存在不可避免的差异。赵向阳等^[56]发现高人均GDP负向影响(即抑制)早期和成熟期创业活动,却正向影响(即促进)高期望和高创新创业活动。这种看似悖论的现象实则反映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创业活动的本质差异^[79],高收入国家的创业活动以勇于承担风险、主动寻求商机为特征的机会型创业为主,在低收入国家则多为因没有找到合适工作而被动从事创业的生存型创业。

要素驱动型经济体主要是自给农业和开采业务,多为非洲地区,部分分布在亚洲和大洋洲地区,

如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印度。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制度环境不稳定、资源匮乏,更多依靠企业家认知能力实现创业,且以提升创业数量为主要目的。与前者相比,效率驱动型经济体具有更高效的生产过程和更高质量的产品质量,其中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居多,较少分布在欧洲东部以及亚洲和大洋洲地区,如阿根廷、立陶宛、中国。此类国家制度水平逐步提升,资源较为丰富,企业家具有认知能力,创业活动数量较多,且创业活动质量逐渐提升。创新驱动型经济体是三者中创新程度最高的,其知识密集型企业占据主导,且服务业进一步扩大,分布在北美、欧洲和东亚地区,如美国、英国、日本。此类国家制度水平完善,资源富裕,企业家具备创业认知能力,且更加重视创业活动的成长性和创新性。结合表3和表4,本研究发现各高阶组态分别代表了3种经济体的创业活动的现象,下面做进一步细化讨论。

对要素驱动型经济体而言,其主要是自给农业和开采业务,严重依赖非技术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由表3的 C_1 可知,正式制度可存在、可不存在,社会和民众对创业行为具有一定的认可度(c_{1b} 、 c_{1c}),可利用资源匮乏(c_{1a} 、 c_{1e}),研发环境缺失(c_{1a} 、 c_{1b})。在驱动创业活动开展的初始阶段,主要依赖企业家的创业意愿和机会警觉,因为政策和税收未给予充分支持且资源短缺的现状限制了企业家从政策或市场中寻找商机的可能,面对多重挑战,是否开展创业活动取决于企业家个体的认知能力。

低经济发展水平背景下创业活动的企业家认知因素内部存在互补关系,本研究认为要素驱动型经济体的正式制度不完善,并且在资源方面受到束缚,创业企业仅可通过激发企业家的认知能力,将可以察觉到新产品或服务的机会与选择成为创业者进行捆绑,帮助企业提升创业活跃度。

通过稳健性检验,表5的 Z_1 和 Z_2 再次印证了企业家认知能力的关键作用。由表6的 Z_{11} 可知,基础设施短缺、R&D转化不足是创业活动质量发展的一大劣势,且创业动机程度低,以生存型创业为主。具体来说,非洲地区的基础设施资源严重不足,其缺少信息传递的通信设备、物资运输的铁路和飞机及存在大片未开发的土地等,且国家或行业整体的研发环境缺失,科技创新水平低,这些会制约创业活动向成长性和创新性发展。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命题2a。

命题2a 对要素驱动型经济体来说,企业家的创业意愿和机会警觉会激发创业活动数量,但基础设施资源的缺失和R&D转化能力的不足会制约创业活动质量的提升。

效率驱动型经济体追求的是更高效的生产过程和更高质量的产品,比要素驱动型经济体国家更具竞争力。效率驱动型经济体国家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因此创业情景更复杂,实现创业活动数量的组态也更多样。结合表3的 $C_2 \sim C_4$,企业家的创业意愿或机会警觉依旧是推动创业活动数量的主要因素。具有机会警觉性(C_2 、 C_3)和创业意愿(C_4)的企

业家能够推动创业活动的开展,且研发环境($C_4 \sim C_6$)作为工具为创业活动活跃性,乃至创新性(表4的 C_8)创造条件,社会和民众认可(C_5, C_6)也为促进经济发展和创造就业提供了一系列制度机会。

效率驱动型经济体的创业活动数量主要表现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欧洲东部以及亚洲和大洋洲3类情况。基于表3, C_2 和 C_3 反映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状况,由于国家政局动荡和社会混乱,国家制度环境不稳定,这些因素导致企业家的创业意愿低。因此,是否选择创业作为职业取决于企业家的机会警觉能力。欧洲东部地区(C_4)拥有良好的研发环境,企业家的创业意愿高。例如立陶宛,其制度环境不够稳定,但其高度的外向型经济促进经济多元化发展,本国具有相当的研发实力,市场的良性运转又促进了企业家创业的意愿。与前两者相比,亚洲和大洋洲地区(C_5, C_6)的正式制度环境更为稳定,非正式制度和研发环境较好。例如中国台湾,作为新工业化地区,基础资源设施和研发环境是开展创业活动必须具备的条件,因为有大陆资本的援助和海峡两岸创业平台的搭建,创业活动也受到民众支持,台湾地区企业家的创业积极性也十分高涨。因此,推动了整个地区创业活动。

效率驱动型经济的创业活动数量模式中存在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基于表3,由 C_4 可知,研发环境为创业活动提供新技术研发、新产品制造和新模式转型的技术氛围,选择创业的意愿更可能实现,因此,R&D转化与创业意愿具有互补作用。 C_5 和 C_6 则说明创业成功的榜样作用吸引着普通企业家更加踊跃地从事创业活动,创业这一职业得到民众的认可,一系列创业活动的成功开展不仅使社会认识到创业行为的经济效应,而且社会和企业将资金投入技术更新与迭代中,从而为创新提供充足的研发成本。因此,非正式制度与R&D转化的互补效应显著。由 C_2 和 C_3 中核心条件可知,非正式制度不存在与机会警觉存在互为替代关系,其中,机会警觉至关重要。创业作为一种职业选择未受到大众群体的认同,创业活动的开展存在规范制度压力,导致企业家的创业意愿不强,这时仅能通过提升企业家发现创业机会的能力,引导企业开展创业活动。对机会的警觉性能够替代创业行为的公众认可度和鼓励度低的情形,在市场信息不对称中发现商机。

基于表6中 Z_{11} 和 Z_{13} 所展示的效率驱动型经济体创业活动质量的组合状态, Z_{11} 为欧洲地区,如克罗地亚、波黑, Z_{13} 为亚洲和大洋洲地区,如哈萨克斯坦、巴勒斯坦。这两大地区共同的组态特征是缺失基础设施(z_{11a}, z_{11b}, z_{13})和R&D转化(z_{11a}, z_{11b})且以生存型创业动机(z_{11a}, z_{11b}, z_{13})为主,由此突出资源条件对企业发展高质量创业活动的重要性。并且,资源通常并不是各自分离的,而是相互关联和组合配置的,竞争优势往往取决于资源间的相互配置。通过组态视角,本研究发现企业从探索哪些是可利用的或可获得的有价值资源(基于稀缺性或李嘉图租金),向考

虑如何捆绑这些资源实现企业创新的方向转变。对比 z_9 与 z_{10} 可知,发展高成长性和高创新性的创业活动,需要以机会型创业为动机,综合配置相关资源,实现资源价值的最大化效益。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命题2b。

命题2b 对效率驱动型经济体来说,企业家的机会警觉、创业意愿与R&D转化的组合,以及非正式制度与R&D转化的组合均会激发创业活动数量,但基础设施的缺乏和R&D转化不足是导致创业活动质量以生存型创业为主的主要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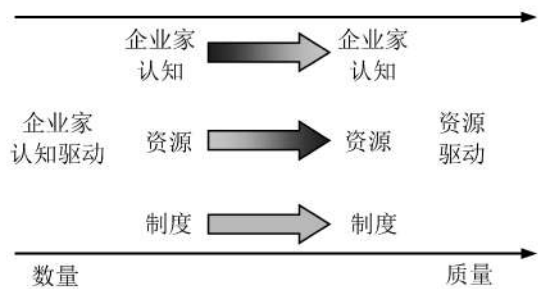
随着经济发展步入创新驱动时代,此时多为知识密集型企业,并且服务部门也进一步扩大。结合表3和表4的组态,在创新驱动型经济体中,创业活动的数量比较少(仅有中国台湾一个案例),但是创业活动的质量比较高(表4的组态主要反映创新驱动经济体)。因此,本研究重点分析实现创新驱动型经济体的创业活动质量的驱动模式。

创业企业的高成长性和高创新性发展的要求,需要有充足的资源基础和研发环境做保障。以德国和日本为例,他们的资源禀赋程度高,拥有可供使用的通信设备、交通、物资等;而且国家的创新水平高,企业以研发为主导,配置资源的能力强。因此,拥有丰富基础设施资源和R&D转化能力的创业企业具备更高的组织资源配置和商业机会把握的支撑工具,为创业活动实现高成长性和高创新性提供足够多的主导权。尽管新的创业行为必然会通过引入一种冲击和\或与现有社会结构相矛盾的新模式来获得社会和民众的认可,但这没有阻碍高研发环境为企业创造与社会认同或既有结构相一致的规范、价值观和模式。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命题2c。

命题2c 对创新驱动型经济体来说,更加关注创业活动的高成长性和高创新性发展,依赖于基础资源设施和R&D转化环境。

5.2 创业活动的量 - 质转化

图1给出创业活动驱动模式中三大因素的表现强度变化。纵向结果表明,第一,企业家个体认知能力影响的表现强度逐渐弱化,即从创业活动数量的主导性作用到创业活动质量在资源基础的框架下发



注:颜色越深表示强度越大。

图1 创业活动转化及其特征示意
Figure 1 Transform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挥辅助作用。这与领导者替代理论的观点一致,随着组织各方面综合能力的提升,组织和环境会替代领导者的部分职责^[80],这种情况表明创业企业开展活动会随着其自身能力的增强逐渐削弱企业家的主导性地位,转化为由资源基础为核心、制度环境和企业家认知为辅助的驱动模式。

第二,企业资源基础的表现强度呈现出上升的态势,且在创业活动质量阶段成为驱动创业企业继续前进的主导因素。这种转变表明随着创业活动的发展及其面临制度情景的变化,企业家个体的认知能力在决定企业发展高创新性活动中的作用愈来愈不具有主导性,此时企业最需要的是作为创业活动开拓性发展的基础资源和技术。其中,国家或行业的研发环境成为创业企业开展创业活动的强有力保障。资源束将不同类型资源聚合在一起产生的组合效应,是逐步获取竞争的权力优势、创造超额组合价值的关键体现^[47]。

第三,制度环境在创业活动由量转质阶段的表现强度呈现平稳态势且始终作为辅助性条件存在。这种情况说明,在开展创业活动的过程中,创业企业始终要考虑制度环境对其活动的影响,在企业家驱动和资源驱动阶段,思考如何响应相应的制度环境并主动为企业带来新的机会。

在创业活动数量阶段,企业家的机会警觉和创业意愿催生了创业企业的出现。在创业活动质量阶段,基础设施和R&D转化激活了创业企业创新运转的动力,主导因素的转化驱动了企业创业活动朝向不同特征方向发展。综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命题3。

命题3 伴随制度、资源和企业家认知3个因素表现强度的变化而表现出模式主要特征的变化,即创业活动数量模式以企业家认知驱动为主要特征,创业活动质量模式以资源驱动为主要特征。

6 结论

6.1 研究结果

本研究以GEM数据为样本来源,通过对基于制度、资源和企业家认知3个方面的两种类型的创业活动的组态分析,得出企业家认知驱动和资源驱动两种创业活动驱动模式,并发现要素驱动型经济体、效率驱动型经济体和创新驱动型经济体的组态差异,研究结果如下。

(1)引入定性比较分析的方法,从组态视角分析创业活动的驱动模式,证实了实现创业活动数量和质量的路径的组合性。创业活动的实现是企业家在多方因素影响下做出的一种战略决策^[54],而定性比较分析非常适合分析不同类型的因果条件并存的组合效果。本研究摒弃了权变视角下的匹配方法,利用fsQCA分析具有共同关键特征的因素组合,详细地讨论了创业活动产生的多方因素的互补和替代作用,以及核心因素和辅助因素的作用。利用定性比较分析的优势,得出了比量化研究更为丰富的结论,深化了创业活动复杂性的认识。

(2)在制度、资源和企业家认知对创业活动影响过程的分析中,发现企业家认知能力和资源基础分别是实现创业活动成长性和创新性的重要角色,同时也厘清了创业活动数量和质量模式中各因素存在的关联性质、具体条件和核心因素。在创业活动驱动模式的研究中证实了基于3个不同层面的6个因素之间的组合效应,比仅从单一或交互方面考虑具有更广泛的指导价值,并且使创业企业对构建不同特征创业活动的路径得到了明晰的说明。研究发现R&D转化在两种创业活动类型中起重要作用,在更好地解释路径组合效应的同时,也识别出创造新的商业机会的研发环境是驱动创业活动实现的关键因素。

(3)本研究在分析创业活动实现机制的同时,意外发现了5个模式(创业活动数量4个,创业活动质量1个)中蕴含的不同经济体的创业活动驱动模式。依据该经济体及地理分布的属性,分析了包含该组态的经济体的特有情景,从而补充了对不同经济体创业活动特征的解释。要素驱动型经济体主要分布在非洲地区,资源短缺且研发水平低,依靠企业家的创业意愿和机会警觉发展低水平的创业活动。效率驱动型经济体分布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欧洲东部以及亚洲和大洋洲地区,亚洲和大洋洲地区比前两者制度稳定,欧洲东部比前者拥有良好的研发环境,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主要依靠企业家的机会警觉能力。创新驱动型经济体分布在北美、欧洲西部以及东亚地区,因其基础设施资源齐备、研发环境优良的优势,开展的多为高质量创业活动。

6.2 管理启示

(1)在驱动创业活动活跃性的情形中,企业家的认知能力作为引导条件应受到重视。一般而言,增强企业家对市场机会的警觉能力,激发对创业的热情和意愿,是多数国家提升创业活动数量的先决考虑条件。机会警觉源于企业家对市场潜在商机的发掘、识别和评估,通过专业化的创业教育,培训企业家对机会的警觉性和把握能力,从而利用机会开展创业活动。在复杂的环境中,企业家的创业意愿需要配合企业家机会警觉能力或企业的R&D转化环境,共同驱动创业活动的开展。在培养企业家创业意愿的前提下,通过尽可能多地察觉商业机会获得新的机遇,或利用研发条件创造新的机会,进一步提升企业家的创业意愿,在两者组合的效果下,激发创业活动的活跃性。研究表明,R&D转化作为资源层面的关键因素也会促进创业活动的开展^[81]。这就需要企业充分利用国家、地区或行业的研发环境为其带来的可开拓新市场和新产品的机会,在既有自身研发水平的基础上,通过开放式创新性学习,促进创业活动的开展。

(2)在驱动创业活动成长性和创新性的情形中,应强调绝对核心因素的企业资源条件。单个资源或许无法创造核心竞争力,通过资源组合,企业运用研发能力,将可利用且易获得的基础设施资源转化

为其独具的竞争优势。依靠国家、地区或行业为创业活动发展提供的研发环境,将可被模仿、被复制的实体资源进行组合,利用R&D转化技术激活实体资源的潜力,创造更具竞争力的核心资源。创业企业对基础设施和R&D转化的有效配置可培育具有高质量的创业活动,对两者的合理开发可以达到 $1+1>2$ 的协同效果。

(3)对要素驱动型经济体而言,由于面临资源缺失的困境,更应重视企业家的创业认知能力的突出效果。开展高质量创业活动需要企业家发挥能动性,利用拼凑能力挣脱资源的约束,采用更为灵活的策略。对效率驱动型经济体而言,在培育企业家机会警觉或创业意愿的同时,更加强调创造一个良好研发环境的重要性。利用科技创新的力量发展更高质量的创业活动,通过创新平台助推企业实现持久发展。对创新驱动型经济体而言,关键在于对基础设施资源和R&D转化能力的合理配置及有效开发,综合考虑其制度环境和企业家认知能力,发挥资源对两者的协同效应。

6.3 局限性和未来展望

①尽管本研究在理论上探讨了3个不同层面的因素组合,但GEM数据反映的是一个国家的整体情况,是一种宏观层面的数据指标。未来可以依据GEM的国家报告,结合微观层面的数据指标,进一步归纳创业活动的驱动模式,并且可选取某一经济体的典型国家,进行国家对比研究。②本研究基于创业活动的结果特征区分数量和质量两种形式,已有研究通过创业动机将创业活动划分为机会型创业和生存型创业^[82],本研究仅将其作为稳健性检验的影响因素。未来可据此对创业活动类型进行更深入、更细致的分析。③本研究选择制度、资源和企业家认知作为驱动创业活动的条件仍存在需要讨论的地方。根据本研究的需要,在创业团队中选取核心人物,即创业者作为研究变量,然而,创业企业的运转可能更多地依赖团队的合作。高阶梯队理论认为创业团队的构成及动态演变对于创业活动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83],未来研究可以考虑创业团队与制度和资源组合对创业活动的影响,以实现在开放条件下在更广的微观层面(创业团队)的变型。

参考文献:

- [1] VAN STEL A, CARREE M, THURIK R. The effect of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on national economic growth.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05, 24(3): 311-321.
- [2] 王玲玲, 赵文红, 魏泽龙. 创业制度环境、网络关系强度对新企业组织合法性的影响研究. *管理学报*, 2017, 14(9): 1324-1331.
WANG Lingling, ZHAO Wenhong, WEI Zelong. The strength of network ties and organizational legitimacy in the new venture: the moderating roles of entrepreneuria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Chinese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7, 14(9): 1324-1331.
- [3] STENHOLM P, ACS Z J, WUEBKER R. Exploring country-level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on the rate and type of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3, 28(1): 176-193.
- [4] ALVAREZ S A, BUSENITZ L W. The entrepreneurship of resource-based theory.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1, 27(6): 755-775.
- [5] ALVAREZ S A, BARNEY J B. Discovery and creation: alternative theories of entrepreneurial action.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2007, 1(1/2): 11-26.
- [6] 周小虎, 姜凤, 陈莹. 企业家创业认知的积极情绪理论. *中国工业经济*, 2014(8): 135-147.
ZHOU Xiaohu, JIANG Feng, CHEN Ying. The positive affect theory of entrepreneurial cognition.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14(8): 135-147.
- [7] TIMMONS J A, SPINELLI S, Jr. *New venture creation entrepreneurship for the 21st century*. 9th ed. New York: Irwin/McGraw-Hill, 2009.
- [8] PENG M W, SUN S L, PINKHAM B, et al. The institution-based view as a third leg for a strategy tripod.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009, 23(3): 63-81.
- [9] DELMAS M A, TOFFEL M W. Organizational responses to environmental demands: opening the black box.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8, 29(10): 1027-1055.
- [10] BARNEY J. Firm resources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91, 17(1): 99-120.
- [11] ZIMMERMAN M A, ZEITZ G J. Beyond survival: achieving new venture growth by building legitimacy.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2, 27(3): 414-431.
- [12] TANG J T, KACMAR K M, BUSENITZ L. Entrepreneurial alertness in the pursuit of new opportunities.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2, 27(1): 77-94.
- [13] BEYNON M J, JONES P, PICKERNELL D. Country-based comparison analysis using fsQCA investigating entrepreneurial attitudes and activity.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6, 69(4): 1271-1276.
- [14] PENG M W. Towards an institution-based view of business strategy.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2, 19(2/3): 251-267.
- [15] BESHAROV M L, SMITH W K. Multiple institutional logics in organizations: explaining their varied nature and implication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14, 39(3): 364-381.
- [16] 道格拉斯·C·诺斯.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4: 50-51, 64-66.
NORTH D C.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4: 50-51, 64-66.
- [17] 马蔷, 李雪灵, 申佳, 等. 创业企业合法化战略研究的演化路径与体系构建.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5, 37(10): 46-57.
MA Qiang, LI Xueling, SHEN Jia, et al. Evolution path and framework construction of legitimation strategy research of start-up enterprises. *Foreign Economics & Management*, 2015, 37(10): 46-57.
- [18] W·理查德·斯科特. 制度与组织: 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 第3版.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60-67.

- SCOTT W R.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 ideas and interests*. 3rd ed.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10:60-67.
- [19] PACHECO D F, YORK J G, DEAN T J, et al. The coevolution of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 tale of two theories.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0, 36(4):974-1010.
- [20] SEO M G, CREED W E D. Institutional contradictions, praxi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a dialectical perspectiv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2, 27(2):222-247.
- [21] 蔡宁, 贺锦江, 王节祥. “互联网+”背景下的制度压力与企业创业战略选择: 基于滴滴出行平台的案例研究. *中国工业经济*, 2017(3):174-192.
CAI Ning, HE Jinjiang, WANG Jiexiang. Institutional pressure and entrepreneurial strategic selections of firms facing internet plus: a case study based on Didi Chuxing platform.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17(3):174-192.
- [22] THORNTON P H, OCASIO W, LOUNSBURY M. *The institutional logics perspective: a new approach to culture, structure and proces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99-129.
- [23] LOK J. Institutional logics as identity project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0, 53(6):1305-1335.
- [24] TOST L P. An integrative model of legitimacy judgment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11, 36(4):686-710.
- [25] 迟考勋, 项国鹏. 转型经济中民营企业制度创业机制的多案例研究: 制度创业策略视角.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6, 37(12):18-32.
CHI Kaoxun, XIANG Guopeng. Multi-cases studies on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mechanism of privately-held enterprises in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strategies. *Science of Science and Management of S.&T.*, 2016, 37(12):18-32.
- [26] 邵兴东, 孟宪忠. 战略性社会责任行为与企业持续竞争优势来源的关系: 企业资源基础论视角下的研究. *经济管理*, 2015, 37(6):56-65.
SHAO Xingdong, MENG Xianzhong. Study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strategic social responsibility behavior and corporate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 sources from the resource-based theory. *Business Management Journal*, 2015, 37(6):56-65.
- [27] CROOK T R, KETCHEN D J, Jr, COMBS J G, et al. Strategic resources and performance: a meta-analysi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8, 29(11):1141-1154.
- [28] 罗辉道, 项保华. 资源概念与分类研究. *科研管理*, 2005, 26(4):57, 99-104.
LUO Huidao, XIANG Baohua. A study of the conception and type of resources. *Science Research Management*, 2005, 26(4):57, 99-104.
- [29] 汪秀婷, 程斌武. 资源整合、协同创新与企业动态能力的耦合机理. *科研管理*, 2014, 35(4):44-50.
WANG Xiuting, CHENG Binwu. Coupling mechanism of resources integratio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and enterprise dynamic capability. *Science Research Management*, 2014, 35(4):44-50.
- [30] GALBREATH J. Which resources matter the most to firm success?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resource-based theory. *Technovation*, 2005, 25(9):979-987.
- [31] 单标安, 蔡莉, 费宇鹏, 等. 新企业资源开发过程量表研究. *管理科学学报*, 2013, 16(10):81-94.
SHAN Biaoan, CAI Li, FEI Yupeng, et al. Measurement of new ventures' resource development process.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s in China*, 2013, 16(10):81-94.
- [32] WOOLLEY J L. The creation and configuration of infrastructure for entrepreneurship in emerging domains of activity.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14, 38(4):721-747.
- [33] MILLER D J. Firms' technological resources and the performance effects of diversification: a longitudinal study.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4, 25(11):1097-1119.
- [34] 余绍忠. 创业资源对创业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3, 34(6):131-139.
YU Shaozhong. The effect of entrepreneurial resource on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based on moderating mechanism of environmental dynamism. *Science of Science and Management of S.&T.*, 2013, 34(6):131-139.
- [35] 于晓宇. 网络能力、技术能力、制度环境与国际创业绩效. *管理科学*, 2013, 26(2):13-27.
YU Xiaoyu. Network competence, technological capability,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 2013, 26(2):13-27.
- [36] GRÉGOIRE D A, CORBETT A C, MCMULLEN J S. The cognitive perspective in entrepreneurship: an agenda for future research.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11, 48(6):1443-1477.
- [37] MITCHELL R K, BUSENITZ L W, BIRD B, et al. The central question in entrepreneurial cognition research 2007.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07, 31(1):1-27.
- [38] 丁栋虹, 张翔. 风险倾向对个体创业意愿的影响研究. *管理学报*, 2016, 13(2):229-238.
DING Donghong, ZHANG Xiang. The influence of the risk propensity on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the mixing effect of entrepreneurship self-efficacy and perceived risk. *Chinese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6, 13(2):229-238.
- [39] 祁浩, 杜涵, 罗婧. 创业行为与创业意愿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5, 32(1):76-82.
BING Hao, DU Han, LUO Jing. Empirical Study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and Willingness. *Science &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Policy*, 2015, 32(1):76-82.
- [40] KRUEGER N F, Jr. What lies beneath? The experiential essence of entrepreneurial thinking.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07, 31(1):123-138.
- [41] FAYOLLE A, LIÑÁN F. The future of research on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4, 67(5):663-666.
- [42] KIRZNER I M. The alert and creative entrepreneur: a clarification.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09, 32(2):145-152.
- [43] MCCAFFREY M. On the theory of entrepreneurial incentives and alertness.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14, 38(4):891-911.
- [44] MUELLER S. Increasing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effective

- entrepreneurship course characteristic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Small Business*, 2011, 13(1):55-74.
- [45] MEYER K E, PENG M W. Probing theoretically into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transactions, resources, and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5, 36(6):600-621.
- [46] DICKSON P H, WEAVER K M, HOY F. Opportunism in the R&D alliances of SMES: the roles of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SME size.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06, 21(4):487-513.
- [47] 韩炜, 杨俊, 陈逢文, 等. 创业企业如何构建联结组合提升绩效? 基于“结构-资源”互动过程的案例研究. *管理世界*, 2017(10):130-149.
HAN Wei, YANG Jun, CHEN Fengwen, et al. How to establish tie portfolio to improve performance for entrepreneurial firms: case study based on interaction of structure and resources. *Management World*, 2017(10):130-149.
- [48] 姜卫韬. 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策略研究: 基于企业家社会资本的视角. *中国工业经济*, 2012(6):107-119.
JIANG Weitao. Research on promotion strategies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in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based on entrepreneurial social capital.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12(6):107-119.
- [49] MAGUIRE S, HARDY C, LAWRENCE T B.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in emerging fields: HIV/AIDS treatment advocacy in Canada.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4, 47(5):657-679.
- [50] DWIVEDI A, WEERAWARDENA J. Conceptualizing and operationalizing the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construct.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8, 86:32-40.
- [51] FAINSHMIDT S, PEZESHKAN A, FRAZIER M L, et al.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a meta-analytic evaluation and extension.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16, 53(8):1348-1380.
- [52] 周健. 创业者社会特质、创业能力与创业企业成长机理研究. 济南: 山东大学, 2017:129-132.
ZHOU Jian. *The effect of entrepreneurial social characteristics and entrepreneurial competency on new venture growth*. Jinan: Shandong University, 2017:129-132.
- [53] FISS P C. A set-theoretic approach to organizational configuration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7, 32(4):1180-1198.
- [54] FOGEL G. An analysis of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and enterprise development in Hungary.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2001, 39(1):103-109.
- [55] 吴伟, 陈仲常, 黄玮. 国家创业生态系统要素与创业活动关系研究.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6, 33(18):7-11.
WU Wei, CHEN Zhongchang, HUANG Wei.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national system of entrepreneurship with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based on a panel data model. *Science &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Policy*, 2016, 33(18):7-11.
- [56] 赵向阳, 李海, RAUCH A. 创业活动的国家(地区)差异: 文化与国家(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交互作用. *管理世界*, 2012(8):78-90.
ZHAO Xiangyang, LI Hai, RAUCH A. The differences among countries (regions) in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the interaction effect between culture and the level of a country (regions)'s economic growth. *Management World*, 2012(8):78-90.
- [57] DHAHRI S, OMRI A. Entrepreneurship contribution to the three pillar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hat does the evidence really say?. *World Development*, 2018, 106:64-77.
- [58] 张玉利, 宋正刚. 创业活动创新性评价及提升创业质量的建议. *社会科学战线*, 2015(7):59-63.
ZHANG Yuli, SONG Zhenggang. Innovativeness and quality promotion suggestions for the enterprise management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Social Science Front*, 2015(7):59-63.
- [59] 龙丹, 张玉利, 李姚矿. 经验与机会创新性交互作用下的新企业生成研究. *管理科学*, 2013, 26(5):1-10.
LONG Dan, ZHANG Yuli, LI Yaokuang. Study on the new venture emergence based on interactions between experience and the newness of opportunity.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 2013, 26(5):1-10.
- [60] CLERCQ D D, LIM D S K, OH C H. Individual-level resources and new business activity: the contingent role of institutional context.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13, 37(2):303-330.
- [61] 魏喜武. 创业警觉性研究前沿探析与相关命题的提出.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09, 31(5):8-14.
WEI Xiwu. The frontiers analysis of entrepreneurial alertness and the proposition of related propositions. *Foreign Economics & Management*, 2009, 31(5):8-14.
- [62] 彭娟, 张光磊, 刘善仕. 高绩效人力资源实践活动对员工流失率的协同与互补效应研究. *管理评论*, 2016, 28(5):175-185.
PENG Juan, ZHANG Guanglei, LIU Shanshi. The synergistic effect in high performance human resource practices: based on the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Management Review*, 2016, 28(5):175-185.
- [63] VAN GELDEREN M, KAUTONEN T, FINK M. From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to actions: self-control and action-related doubt, fear, and aversion.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5, 30(5):655-673.
- [64] FISS P C. Building better causal theories: a fuzzy set approach to typologies in organization research.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1, 54(2):393-420.
- [65] 唐鹏程, 杨树旺. 企业社会责任投资模式研究: 基于价值的判断标准. *中国工业经济*, 2016(7):109-126.
TANG Pengcheng, YANG Shuwang. Research 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vestment pattern: based on value criterion.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16(7):109-126.
- [66] DHEER R J S. Cross-national differences in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role of culture and institutional factors.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17, 48(4):813-842.
- [67] 杜运周, 贾良定. 组态视角与定性比较分析(QCA): 管理学研究的一条新道路. *管理世界*, 2017(6):155-167.
DU Yunzhou, JIA Liangding. Configuration perspective and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 a new approach to management research. *Management World*, 2017(6):155-167.
- [68] RAGIN C C. *Re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fuzzy sets and be-*

- yo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50.
- [69] KRAATZ M S, MOORE J H. Executive migr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2, 45(1):120-143.
- [70] GARCIA-CASTRO R, FRANCOEUR C. When more is not better: complementarities, costs and contingencies in stakeholder management.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6, 37(2):406-424.
- [71] 张明,陈伟宏,蓝海林. 中国企业“凭什么”完全并购境外高新技术企业:基于94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 *中国工业经济*, 2019(4):117-135.
ZHANG Ming, CHEN Weihong, LAN Hailin. Why do Chinese enterprises completely acquire foreign high-tech enterprises: a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 based on 94 cases.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19(4):117-135.
- [72] 王凤彬,江鸿,王穗. 央企集团管控架构的演进:战略决定、制度引致还是路径依赖?—一项定性比较分析(QCA)尝试. *管理世界*, 2014(12):92-114.
WANG Fengbin, JIANG Hong, WANG Cong.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trol framework China's central SOEs: is it strategy determined, institution driven, or dependence on the path? An attempt of a quality comparative analysis. *Management World*, 2014(12):92-114.
- [73] 程聪,贾良定. 我国企业跨国并购驱动机制研究:基于清晰集的定性比较分析. *南开管理评论*, 2016, 19(6):113-121.
CHENG Cong, JIA Liangding. Research on the driving pattern of China's enterprise cross-border M&As: a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Nankai Business Review*, 2016, 19(6):113-121.
- [74] MARX A. Crisp-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csQCA) and model specification: benchmarks for future csQCA applic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ple Research Approaches*, 2010, 4(2):138-158.
- [75] BELL R G, FILATOTCHEV I, AGUILERA R V.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investors' perceptions of foreign IPO value: an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4, 57(1):301-320.
- [76] 尹志超,宋全云,吴雨,等. 金融知识、创业决策和创业动机. *管理世界*, 2015(1):87-98.
- YIN Zhichao, SONG Quanyun, WU Yu, et al. The financial knowledge, the decision making in starting a business, and the entrepreneurial motivation. *Management World*, 2015(1):87-98.
- [77] 程聪. 我国资源型企业跨国并购决策模式研究:国家制度与组织惯例的视角. *科研管理*, 2019, 40(6):111-120.
CHENG Cong. A research on the decision-making of resource-based company's cross-border M&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te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al routines. *Science Research Management*, 2019, 40(6):111-120.
- [78] BARNEY J. Firm resources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91, 17(1):99-120.
- [79] 李新春,叶文平,朱沅. 社会资本与女性创业:基于GEM数据的跨国(地区)比较研究. *管理科学学报*, 2017, 20(8):112-126.
LI Xinchun, YE Wenping, ZHU Hang. Social capital and female entrepreneurship: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ransnational (regional) data based on GEM data.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s in China*, 2017, 20(8):112-126.
- [80] HUSSAIN G, WAN ISMAIL K W, RASHID M A, et al. Substitutes for leadership: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Management Research Review*, 2016, 39(5):546-568.
- [81] 张秀娥,王超. 创新驱动下我国创业生态环境优化研究:基于GEM数据分析. *经济问题探索*, 2018(5):45-52.
ZHANG Xiue, WANG Chao. Research on the optimization of entrepreneurship ecosystem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novation-driven: based on GEM data analysis. *Inquiry into Economic Issues*, 2018(5):45-52.
- [82] ANGULO-GUERRERO M J, PÉREZ-MORENO S, ABAD-GUERRERO I M. How economic freedom affects opportunity and necessity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OECD countries.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7, 73:30-37.
- [83] 戴维奇,刘赫,林巧. 董事会断裂带对创业导向的影响:行为整合机制的调节效应. *财经论丛*, 2018(4):83-93.
DAI Weiqi, LIU He, LIN Qiao. Corporate board faultline and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the moderating roles of behavioral integration. *Collected Essays on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18(4):83-93.

Research on Driven-pattern of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Based on Country(Region)

SUN Yongbo¹, DING Yixin¹, YANG Yang^{1,2}

1 School of Business, Beij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China

2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re for State-owned Assets Administration, Beijing 100048, China

Abstract: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as a way of multi-party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economic activities, are influenced by macro, medium and micro-level factors. The fact that the driven-pattern of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are difficult to interpret with a single

factor has gained consensus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Although there are considerable national differences in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the interpretation of influencing factors is limited. Multidimensionality and complexity are root sources that fail to fully explain the realiz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and,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that clearly defines these factors must be sough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nfiguration of multiple complex antecedent condition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riven-pattern of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form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institutions, resources and entrepreneurial cognition, and the difference of driven-pattern between different economi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al traits of driven-pattern of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In this study, 87 countries (regions) in the Global Entrepreneurial Monitor database in 2012-2016 are selected as research samples, the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 was used to test hypotheses and propose proposition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① Adopting a combination and core model of three elements can explain the driven-pattern of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from multiple levels. ② Opportunity alertness, or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or informal institution, or R&D transformation is a key factor in stimulating the quantity of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the combination of infrastructure resource and R&D transformation are the core conditions i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③ The factor-driven economies emphasize the quantity of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stimulated by entrepreneurial cognition; efficiency-driven economies not only develop the quantity of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but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quality of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innovation-driven economies highlight the role of resource in promoting the quality of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There are big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hree types of economies. ④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have transformed from the quantity pattern characterized by entrepreneurial recognition-driven to the quality pattern characterized by resource-drive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onfiguration, first, we explains the combination pattern of the institutional at the macro level, the resource at the medium level, and the entrepreneurial cognition at the micro level. Second, we further clarifies the key factor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in different economies. Third, we finds the trans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from the quantity pattern to quality pattern. Furthermore, this study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driven-pattern of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quantity pattern and quality pattern, 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entrepreneurs to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of three elements in different economies.

Keywords: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institution; resources; entrepreneurial cognition;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Received Date: July 8th, 2018 **Accepted Date:** November 5th, 2019

Funded Project: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18BGL083, 172DA056);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Beijing (9172007)

Biography: SUN Yongbo, doctor in management, is a professor in the School of Business at Beij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interest focuses on business operations management. His representative paper titled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 was published in the *Management World* (Issue 7, 2011). E-mail: sunyb@btbu.edu.cn

DING Yixin is a master degree candidate in the School of Business at Beij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interest focuses on entrepreneurial management. His representative paper titled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external knowledge acquisi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y recognition" was published in the *Research o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Issue 5, 2018). E-mail: dingyixin233@163.com

YANG Yang, doctor in management,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School of Business at Beij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and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re for State-owned Assets Administration.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FDI and group control. Her representative paper titl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decision-making rights allocation in large group companies" was published in the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Issue 1, 2016). E-mail: yangyangseu@162.com □